

红军挺进师 与浙南游击根据地

● 张敏卿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军挺进师 与浙南游击根据地

张敏卿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张敏卿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4-08340-7

I. 红… II. 张… III. 革命根据地—史料—浙江省—1943~1946 IV. ①K295.5②K2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2560 号

书 名 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

作 者 张敏卿

责任编辑 王世喜

封面设计 奥 登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呼和浩特市金领雅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204-08340-7/K·485

定 价 1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序

我深深地眷恋生我养我的浙南这块土地，离开时是挂着红领巾，现已进入古稀之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浙南的开发比较晚，像温州（浙南的中心），被人称之为“南蛮”之地；现在一说起温州，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那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很富，很有钱；不过它曾经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地方，出了许多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里不想把话扯开很远，只是说，其实那是一块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地方。眼下，我非常欣慰地见到敏卿君所写的这本《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就是介绍浙南地区革命斗争史的著作。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曾专门搞过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的调研与编写；近几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不断地涉足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研究工作，对其中的许多情况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亮点，它不仅是浙江革命，也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一大骄傲。正因为如此，在国家规定的 30 条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和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名单中，温州市浙南（平阳）抗日根据地也被列入其中。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关于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是不够的。

随着国家红色旅游事业的不断推进，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与全国各地主要红色旅游线路的迅速发展相比，浙南地区的红色旅游项目开展的相对落后，这其中不乏有旅

游项目本身知名度不够高、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等先天不足的客观原因,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滞后及其由此引发的宣传不力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基本原因。完全扭转这一局面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一定要先行,并且一定要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作出有鲜明浙南游击根据地特色的学术精品,以作为浙南发展红色旅游事业不可缺少的文化内涵和学术支撑,从而奠定浙南长期发展红色旅游事业的根基。《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作者正是立足于国家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事业的时代背景,抓住了作为国家确立的 30 条精品旅游线路之一的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研究相对薄弱的现实,其对浙南地区发展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是 2005 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浙南红色旅游史学基础研究”的成果之一。全书比较全面地研究和阐述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组建及其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历史过程,并对其革命活动的主要历史功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就目前来说,该作品是全国仅有的专门全面记述挺进师战斗历程的学术著作。从学术意义上说,长期以来,经过各地党史研究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工作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就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情况看,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无疑是浙南游击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挺进师,就没有浙南游击根据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是浙南游击根据地最宝贵的财富,是今天开展浙南红色旅游事业的最重要的历史依托。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看到专门详细研究挺进师战斗历程的学术专著。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挺进师在浙南的活动流动性较强,先后辗转在浙西南、浙东、浙南及闽北等地,而现在地方的研究工作多处“割据”状态,没有人轻易越界研究。其次,在传统的观点里,挺进师开创浙南游

击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浙南革命斗争史发展当中的一段历史,很少有人把它拿出来单独仔细研究。再次,由于地域的偏远和价值长期被低估等因素,很少有人愿意问津。当然,还有历史本身的一些争论。这些是造成当前对挺进师的专门学术研究出现“盲点”的主要原因。而《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正式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研究的缺憾。

从该书稿整个的写作情况看,全文引用的史料丰富,言之有据、有理,特别是对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评价部分比较客观地树立起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其对提升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学术地位和扩大它在全国的影响都有很好的作用。

当然,既然是率先在该研究领域出版的学术作品,其需要改进的地方自然不少,但瑕不掩瑜,敏卿君无疑在史学研究方面做了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今后在浙南游击根据地领域内的进一步探索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树标

丙戌年夏于杭州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5)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浙江的关注	(5)
第二节 北上抗日先遣队	(19)
第三节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诞生	(40)
第二章 挺进浙江——在滔滔的逆流中向上	(59)
第一节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59)
第二节 浙南青帮和红军挺进师第五纵队	(88)
第三节 中国革命退却中的局部反攻	(100)
第三章 “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的建立之一	
——第一次反“清剿”斗争	(119)
第一节 保卫浙西南	(119)
第二节 分兵浙东	(156)
第三节 挺进浙南	(164)
第四节 回师浙西南	(197)
第四章 “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的建立之二	
——第二次反“清剿”斗争	(205)
第一节 烽烟又起——峰文战斗	(205)
第二节 漫漫长夜	(212)
第三节 人民群众对红军挺进师的大力支援	(234)
第四节 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新发展	(241)

第五章 浙南游击根据地何以建立的史学探析	(265)
第一节 对敌斗争战略的及时转变.....	(265)
第二节 动员和依靠民众.....	(278)
第三节 党的组织建设.....	(286)
第六章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293)
第一节 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恢复和与国民党浙江 地方当局的谈判.....	(293)
第二节 中共中央保留并提高浙南游击根据地的 历史分析.....	(302)
第三节 山门集中整训和奔赴抗日前线.....	(307)
第七章 历史的余波	(315)
第一节 关于挺进师的后记.....	(315)
第二节 红色遗产与红色旅游之兴起.....	(319)
第三节 对浙南红色旅游史学价值的重新认识	(324)
后 记	(332)

绪 论

1934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国共双方的百万大军在苏区的土地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厮杀——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正进行到关键时刻。是年盛夏时节,在中央苏区外围展开攻击的国民党军队分北、东两路共计31个师的兵力发起进攻,中央红军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实行了一条以“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错误的军事路线,这导致了中央红军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连续失利。在苏区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作出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达到吸引蒋介石的部分兵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战略目的。

1934年7月7日,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踏上了北上的征途。11月初,历经转战的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皖南太平县境会师,组成了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12月,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翌年1月,方志敏在战斗中被害,北上抗日先遣队遂宣告失败。

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其余部在粟裕、刘英等的率领下重整旗鼓,并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1935年初春,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国民党统治的

核心地带浙江,通过连续三年坚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广阔的浙南地区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浙南游击根据地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等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域,先在浙西南,即龙泉溪以北,包括龙泉、庆元、景宁、遂昌、江山、松阳、云和等县及闽北之浦城县一带边区。后来转移到浙南,即龙泉溪以南,庆元县以东,包括瓯江流域下游南部的泰顺、平阳、瑞安等县及闽东之福鼎等地区。而整个浙南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路义乌——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之温州、台州、金华、衢州等8个地区的30个县,及闽东、闽北和赣东边沿地区,纵横五百余公里。到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战争的范围遍及浙江南部和闽浙赣交界的三十多个县。在浙南特委的领导下,县委发展到六个、党员三千多人、地方工作干部五百多人。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会、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人数达10万之众。^①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包括浙南、浙东和浙西南在内的浙南游击根据地,虽然后来有所反复,但基本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它与南方八省^②十四块^③革命根据地一起被称为是“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④由于这些地

①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温州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第93页。

② 即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③ 即: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湘赣、湘南、琼崖。参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部分。也有14块的说法,参见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259页。

④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又参见《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方都在浙江的南部或靠近南部,所以在《毛泽东选集》、《新四军军史》以及中央有关文献上统称之为“浙南游击根据地”。

抗日战争开始后,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挺进师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进行了整编,随即北上抗日,成为了新四军的一部分,浙南也成为了新四军的后方之一。新四军军歌词中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铁流”,八省中的浙江省健儿,就是指浙南的红军挺进师和浙南的子弟兵。

本书主要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光辉战斗历程为基本线索,对挺进师在浙南等地区的战斗和生活进行全方位的史学研究,以此来告慰先烈并丰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学术研究,为浙南地区的红色旅游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章 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浙江的关注

一、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浙江

浙江省简称“浙”，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背靠内陆。因钱塘江流向曲折与浙同音，又称浙江，渐成地名。浙江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现已发掘的考古资料看，早在五万年前——远古的旧石器时代，浙江这块土地上就有古人类的生存。浙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化名人灿若群星，拥有被誉为“中华文明曙光”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就在浙江。

春秋战国时期，浙江曾先后为越国和楚国的疆域。春秋时期的越国，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魏晋以后，因为晋室的南迁，包括浙江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开发加快，成为当时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自南宋以来至近代，浙江经济文化更加发达，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南宋吕祖谦、叶适、陈亮，明代的王阳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清末民初以后的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等。特别是以南宋和明清的“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学术文化，是恢宏壮丽的中国文化史上极其灿烂的篇章。

在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浙江也有着十分独特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早年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浙江籍的具有

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也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譬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就是浙江籍的知识分子陈望道先生首先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马列主义的诞生。据考证:当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后,认为应当把这本书尽快翻译成中文。刚巧,戴季陶先生主编了《星期评论》后,也打算物色一位合适的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邵力子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因此,陈望道从1920年2月至4月,在家乡义乌分水塘村,根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所收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出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这本书问世后迅速流传,到1926年5月该书就已经是第十七次再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和发行,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中国人,就是在读了《共产党宣言》后更加坚定了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而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历史潮流中,不仅陈望道因为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而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浙江的俞秀松、施存统也是在这一潮流中完成了自己从空想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嬗变。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中,浙江籍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中,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沈定一等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譬如:陈望道主编的《新青年》就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1920年2月《新青年》社从北京迁回上海后,陈独秀先后邀请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参加编辑工作。自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成为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刊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2月,陈独秀赴广东后,由陈望道任《新青

年》的主编。陈望道主编了八卷五号至九卷三号的《新青年》，刊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像陈独秀的《谈政治》就是在这期间发表的。另外，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大”会场遭到法国巡捕的突然搜查，会议一时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而在上海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开会地点的情况下，代表们接受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建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浙江嘉兴南湖正式宣布成立的，这也显示了早期浙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是把主要的力量用于领导工人运动，同时，对农民运动也开始关注，而在重视农民这一中国革命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浙江籍的共产党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邵力子、沈定一是他们中间杰出的代表。他们为了发动农民，比较早地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农民、工人等劳动者相结合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比较早地开始从事农民运动。譬如：沈定一领导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解决中国现代农民问题的最初尝试之一，虽然运动的时间不长，但它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开始的重要标志。

如此等等。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江革命斗争是伴随着党的创建就开始了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浙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历时 28 年的革命斗争中，虽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浙江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基本没有停止过。到 1949 年浙江全境解放，浙江全省的党员人数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仅有的三人发展到 4.7 万人，浙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我们说浙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重要，不仅是说浙江的

共产党员和群众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是从反革命的阵营来看,在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如果我们离开了浙江在中国革命中许多独特的东西来谈中国革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中国反革命阵营的头子蒋介石的老家就在浙江,而蒋介石所以在军阀混战的中国大地上称雄一时,其与来自浙江本省籍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与作为“江浙财阀”^①重要代表的浙江籍财阀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而“江浙财阀”利用其经济实力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不断施加影响这成为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历史现象。应该说,江浙财阀有着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经追随过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譬如: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王一亭(浙江湖州人),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并担任过上海分会机关部的财务科长。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攻打制造局时,他曾慷慨陈词:“与其引颈待戮,毋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其词激昂,“众为欢呼”^②上海光复后,他任军政府商务总长,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为革命军筹款达数十万元。在北伐军出师之初的1926年7月,上海总商会代表王晓籁(浙江嵊州人)曾组织上海的工商界代表前往广州参观政治、商业,代表上海的工商业者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为日后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合作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早年与江浙财团的要人过往甚密,如陈其美(浙江吴县人)、张静江(浙江湖州南浔人)等人,他们都曾经是江浙地区在政界和商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北伐战争开始不久,由于共同

① 史学界普遍认为“江浙财团”是一个控制着上海商界,来自宁波帮及宁波周边地区在上海的江浙籍商人和银行家的组织。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史学界认为江浙财团是蒋介石集团得以依赖建立政权的财政支柱。参见邱松庆:《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5期。

② 转引自史全生、高维良、朱剑著:《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的利益和需要,蒋介石和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上海的江浙财团逐渐靠拢。自迁都之争后,蒋介石另立中央的野心日益明显,而要实现这一政治目的,控制着中国主要经济命脉的上海资产阶级能否支持他就显得特别重要,对此,蒋介石非常清楚。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汉的宁波会馆召集江浙帮的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927年2月,江浙财团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像虞洽卿(浙江镇海人)和钱新之(浙江吴兴人)都曾经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过密谈。从此,蒋介石和江浙财阀在反共问题上便携起手来了。正是在浙江财阀的大力扶持下,出生于浙江奉化的蒋介石才最终成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代枭雄。

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时代,它被中国人民称为是“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而四大家族中浙江便占了蒋、陈两家。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中国国民党衍生出了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江浙系”群体,譬如,蒋介石政权中的核心人物陈诚(浙江青田人)、汤恩伯(浙江武义人)等都是浙江人。在这个统治核心的外围,云集了一大批国民党的高级文官武将,像陈布雷(浙江慈溪人)、戴笠(浙江江山人)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此,浙江在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常常被冠以蒋介石政权的“根本”^①和“老剿”^②,早在1933年时毛泽东就称之为“敌之根本重地”。有人曾形象地这样比喻,如果把南京比作国民党统治的“首脑地区”的话,浙江便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其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浙江是国民党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必然有着十分

①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② 参见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共丽水市党史研究室编,第114页。